

第一章 日本的传统与 日本资本主义

1、无形的原则

问题的缘起

当今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譬如说“资本主义”一词当把它像标签一样贴出之后人们就规定所有贴上标签的对象都具有了和“资本主义”一词的定义相同的内容。

于是，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消失了。这样一来，通用于美国的形形色色的分析和研究成果以及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等等，全都通用于日本了。然而，它们果真是通用的吗？

我曾参加过一个人们簇拥着某一著名经济学家而坐的会议。然而，在听他讲演的过程中，我却产生了一种多少有点奇异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似乎正在对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于日本的虚构的对象进行分析、批判，然后提出了他的政策主

张。

问题是，在他头脑里描绘出来的所谓“资本主义”不存在于日本，存在于日本的全然是别的什么。如果确是这样，他只能就存在于他头脑里的虚构的对象提出他的政策主张。现实的日本无视这些，而是以某种“无形的原则”运行着。那么，究竟什么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无形的原则”呢？疑团不断涌起，我便冒昧地向他问道：

“我是一家名叫山本书店的出版社的主人 即中小企业主中的一个，我的交易对象同样都是中小企业，其中被称为大代销店的经销公司就是最大的企业了 即便是它们 经销总额也不及综合商社的九牛一毛。在这样的天地里，只能让我感到您所说的是和我们完全无关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如果还有其它中小企业主在座，我想他们会和我有同感，虽然他们不会像我这样失礼。我听说日本企业总数的 95% 以上是中小企业，在那里工作的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 85%。因此，即便假定您所论述的对象存在于日本，也仅仅和 5% 的大企业以及在那里工作的 15% 的从业人员有关。在论述日本经济的时候，无视其全部的 95% 和 85%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是一位雄辩家。我以为随之而来的会是他激烈的反驳，然而他沉默无语，过了很长时间，最后才突然说道：“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我的质问也许有些不合时宜。座席上进行的是一种智慧的博弈，破坏了博弈的前提则是失礼的。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出现了冷场，难堪的沉默笼罩了会场。

片刻之后，与会者中的一人好像打圆场似地说：“不错，大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只占 5% 和 15%，但是，既然这些大企业左右着整个日本经济，其余的也就尽在论述之中了。”意思是经济学家的讲演并非是对虚构对象的空谈。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继而说道：“诚然如此。但是，如果您说的是事实，并且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以不同的原则运行的话，那么，我们中小企业在和大型企业交易的时候，就好像和外国公司打交道那样，必定要产生混乱。虽然中小企业多是委托加工企业，但和母公司交易的时候，决不会产生和外国公司交道那样的混乱。因此，就其内在方面而言，我不认为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是以不同的原则运行的。”

又是冷场。我深知，在日本必须谦恭有礼，忌

讳不分场合地使人扫兴。但是，我既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也不是有意向讲演者发难，决不是。我不过想知道日本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遵循着同一“无形的原则”这一现实的规范而已。

传统与现代

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确遍布于世界，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外在形式相同则内在本质相同这种看法正确吗？

譬如，像马克斯·韦伯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联系在一起那样，把华侨资本主义世界与新教伦理联系在一起会怎样呢？也许有些滑稽。他们自有他们的实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伦理，所以，“新教伦理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命题除了证明二者无关外，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想发现华侨社会的“无形的原则”就必须探索“中国的传统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中东也同样如此，我多少知道一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土著资本家的情况，这些还完全不为日本所知。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当然与欧美、日本大相径庭，也不同于华侨。从我们的标准来看，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这种差异并不奇怪。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

传统的社会结构，它们以和人们的精神结构相应的形式运动着，那里存在着不同的原则。不同社会里的公司也是这样，虽然形式同为资本主义企业，但各自的内情却完全不同。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所谓“无形的原则”。对外部来说确实是无形的，但在内部则是不言而喻的，它毫无隐瞒地、公开地贯彻着自身。

然而，这一点在日本却多少有点微妙。正如前面谈到的，如果不以“中国的传统与华侨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观点来探索华侨社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样，如果不以“日本的传统与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这种观点来把握日本社会是不会发现其“无形的原则”的。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在日本，它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似乎这也成了某种“无形的原则”。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前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的情景。当然，在探讨问题这一意义上，这种会议是必要的。但是，除非贯穿于日本社会的“无形的原则”得到清楚的解释，否则必然无法了解现实，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前提条件是明确究竟什么是“无形的原则”？

当然，这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问题。譬如，的确可以输入议会制度，但

却不能输入议员和选民。所以，由此形成的议会没有起到和输出国的议会同样的机能作用并不意外。指责它没有起到同样的机能作用是一件连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作为证明，只要看一下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就足够了，十四五岁的孩子会漂亮地论证他的观点，使你没有反驳的余地。但是，千百遍地重复这种论证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进行论证的孩子本身的行动也是遵循“无形的原则”的。问题在于，以舶来的标准对其余的一切横加指责，而不知对自己因循“无形的原则”的作法反躬自问，这也是“无形的原则”之一。

本书不准备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它们应当留在别处解决。本书的主题是探索经济领域里的“无形的原则”。作为基本材料，我们一开始就把中小企业提出来，是因为中小企业属于这样的世界，那里始终贯穿着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说明的经济原则，它具有某种合理性，如果对它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将没有立身之地。当然，我也是这一世界里的一员，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大半生，至今仍身在其中。我既不是局外的旁观者，也不是中小企业评论家。从我自己来看，被冠以“评论家”这一奇妙的头衔，是我五十岁以后的事情。在此

之前我是出版社的一个职员 或者还不如说是一个伙计，最后是一家小出版社的主人。和我同样的那些中小企业主 环视一下自己的周围 就会发现他们完全被所谓的学术界忽略了，人世间充满了这种使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意外地取得了战后复兴和经济增长，而这些又被仅仅和大企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所熟知的印刷业、装订业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这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它们的成长道路。

学问与经验

占日本企业总数 95% 以上的中小企业的主人 是战后经营管理的主要承担者 他们多数没有学历。我所知道的一些印刷厂、装订厂的经营者们 当然不知道现代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兴的经营管理学为何物。进入经济增长时代以后，“经营者”之类的提法才在他们的世界里流行开来 而在创业时期 他们还是“老板”。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创业者，或者是实际上的创业者。因为经过美军的狂轰滥炸，战前的小企业群彻底毁灭了。他们中的半数以上出生于

大正中期 和田中角荣、小佐野贤治等代表人物同属一个时代。他们和战前的高等教育以及战后的新兴教育无缘 而是通过观察和体验 从“人间这部巨著”里学到了必要的知识 并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建立了某种经验准则。他们就是根据这种经验准则去对待一切的，这种经验准则在他们的世界里是普遍被尊重的，对他采取蔑视的态度，将不会有一本书送到读者的手中。

奇妙的是 笛卡儿和石田梅岩也是从“人间这部巨著”里获取真知的。当然 这并不是说中小企业主和他们两人是一样的。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从“人间这部巨著”里懂得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精神结构 通过切身的体验 掌握了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

不过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陷入了失语症的苦境 既不能通过语言表达自己懂得的东西 又不能通过文字传播自己的见解，使它们成为社会的共同经验。因此 他们对标榜为“学问”的东西 怀有一种既爱慕又憎恶的复杂感情，表面上充满了敬意 内心深处却讥其为纸上谈兵。尽管如此 他们对世代相传的经验则表现出异常强烈的求知愿望。

总之 他们以“ 我们的资本主义及其伦理 ”彻底地反驳了那些饱学的先生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需要通过讨论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盈利多少。不能指责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们深知空谈绝对不会符合实际。

对他们来说，“ 学问 ”不过是在知识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剧，其中自有其注定的结局。以经验来观赏这一幕剧 即便他们愿意从中获得某种启示 他们也根本不会相信现实的世界会和剧中的情节相同。

这就是他们蔑视纸上谈兵和专注于自身经验的原因。如果有人把空谈当做适用于现实的原则 由此招致了破产 他只会成为他们嘲笑和讥讽的对象。或者说，他们以他们的眼光注视着那些把舶来的戏剧在现实中重演而遭到毁灭的人，此时他们善意的评论最多就是“ 这个人莫不如去当学者 ”意思是“ 这个人莫不如去当演员 ”。

输入经济学与悲剧

我进入出版界已有三十余年，在此期间看到了很多破产的悲剧，既有足以代表战前日本水平的超级出版社的破产，也有已延续了四代的日本

最早的出版社的破产。这就是改造社和内田老鹤圃。

意味深长的是，这两大具有象征意义的破产事件 共同的地方是战争刚刚结束 他们的第二代和第四代就赴美留学 学习经济学、管理学 回国后则把学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实际。在名古屋有名的老牌店家中也有类似的例子。对旁观者来说 恰如他们的想法：“这个人莫不如去当学者”，然而对我来说，出版界的这两个例子却是一种启示。

创造社现在已消失得踪迹全无，就连它的名字也被遗忘了。内田老鹤圃则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一家新的出版社。该出版社的人一向与我亲密 使我有备悉其内情的机会 说起来确实不可思议。简而言之 就是老一辈伙计们认为 如果听任年轻的主人如此干下去 出版社就会完蛋 联合债权人发动了“政变”，驱逐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的主人，以债权人为股东，由伙计自己进行经营，迅速扭转了出版社破产的局面。只有一点发生了变化 就是在原来出版社的名字上加上了“股份公司”几个字。除了那位导致出版社破产的第四代经理以美国方式进行经营管理的二三年外，

这家出版社以伙计们的经验准则迅速地恢复起来 至今仍完美地存在着。说得奇妙点 如果那位第四代经理对出版社的业务毫不关心的话，也许就不会被驱逐了。

那位继任了经理的伙计，虽然根据经验领会了“日本资本主义的精神”却完全不懂什么经济学、管理学之类的学问。他所领会的是不折不扣的“无形的原则”但他无法诉诸语言表达这一原则，并以这一原则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的经理进行交流。因为他无法使自己的经验准则和年轻的经理的舶来学问共同用于生产讨论中。

他知道如果讨论起来自己肯定会被驳倒 但他也知道即便被驳倒 还是自己正确 所以他只好采取聆听教诲的态度。在这种态度的背后实际上他有很强的自信心 在语言的争辩中我失败了 但在现实的斗争中我一定会胜利。对他凭经验所知道的一切 如果有人用语言进行挑战 他也许会 and 前面提到的那位经济学家一样 只好说：“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他确实是支撑着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营者的一个典型。作为经营者，他有足够的力量 但争辩起来却有口难言。这是一个证据 表明

日本的公司以和经济学、管理学无关的“无形的原则”运行着。

终身雇佣制

是的 不仅别的人 我也一再为“无形的原则”所困惑，陷入窘境。其中最使我为难的是我无法回答一些对日本已有相当了解的外国人提出的问题 譬如说有人问道：“据说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那么签定了什么雇佣契约吗？”

日本确实以终身雇佣为原则 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以进入一流企业为目标，而为此又以进入一流大学为目标。尽管人们为究竟应该实行年功序列制还是实行能力序列制而争论不休，但这充其量是一个在某一企业或某一企业群范围内晋升的问题，争论本身就是以终身雇佣为前提的。那么，在进入一家公司的时候 是否和公司签定“终身雇佣契约”呢？当然没有这样的事。所有的人根据“无形的原则”都知道 如果有人认为既然已向社会表明了终身雇佣制，进入公司之际当然要签定终身雇佣契约 那么他从一开始就不会被录用 或者被取消录用资格。

因此，我只能这样回答那位外国人提出的问

题：“日本实行终身雇佣制，但没有终身雇佣契约，如果一个人提出这种要求，他将不会被任何公司录用 他本身就会为终身雇佣制所抛弃。”

假如那位外国人进而问道：“不可理解 为什么声称终身雇佣制，提出签定终身雇佣契约的要求反而会被排除在终身雇佣制之外呢？请你解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在默不作声和‘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之间进行选择。”

但是 如果说这很奇妙 就是说日本社会整体很奇妙，对这种奇妙的弊端进行评论本身同样很奇妙。首先，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论述一个具体问题，譬如关于最近日本的少年自杀。少年自杀作为一个问题 不是今天突然产生的 也不是战后的特征，与世界各国相比日本也不是特殊地多。然而 人们立刻把它和教育、高考、偏差值等联系起来 认定它是万恶之源 以为只要消除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在少年自杀的背后隐藏着渴望进入一流大学的现实，而这一现实的背后则隐藏着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毕业于一流大学 就可以占据进入一流公司、获得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好处这种最有利的地位。而且，一旦身入其中，只要没有什么意

外，他们不必担心从一流公司的雇员这种社会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这种地位上，他们的今天得到了保证，同时他们的明天也得到了保证。

争取进入一流大学就像毫无风险的赌注一样。换句话说，就像购买还本的彩票一样，人们相信，即便抽彩不中，也会收回对一流大学所下的赌注。只要这种信仰为事实所证明，人们当然要蜂拥而上争购这种还本的彩票。蜂拥而上难免要有牺牲者，于是报纸对此进行抨击。但是，一位记者为了获得能对此进行抨击的位置，他必须首先进入报社，而为了进入报社，他又必须进入一流大学。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象，为了获得抨击‘蜂拥而上’的位置，他也必须蜂拥而上。

在这一现实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这就是年功序列。不言而喻，它不是从公司开始的，而是从大学开始的。入学虽然不同于进入公司，但却不必担心像外国大学那样因不及格而被淘汰，可以一直待到毕业，就像一直待到退休一样。虽然有学分制度，升级最终决定于‘年’和‘功’即成绩，二者相结合就可以毕业，获得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并且，只有获得这种地位，才能获得加入公司的‘年功序列’的资格。

这里的原则是，一名学生的‘功’即成绩或研究成果会转化为某种“序列”。在公司里，所谓能力主义的问题，也仅仅是在“序列转化”上如何评价一个雇员的经验和才能，二者都构成了“功”，并没有改变‘功’转化为‘序列’这一本质。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小企业。

年功序列制

当谈及中小企业的年功序列制时，也许有人感到不可思议。一些人认为中小企业中并不存在年功序列，但是，如果看一看那些生活于中小企业中的人们就会知道，中小企业仅仅是在‘功’转化为‘序列’的方式上不同，本质上与大企业毫无二致。

让我们停止这种抽象的解释，看一看在战后三十年里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印制、装订公司的经理们的履历。在他们的履历表中记载着中小企业的年功序列。

H 先生，已六十过半，退休后在家闲居。他是一个诚实的、具有手艺人特征的人，平时寡言少语，态度简慢，我手下的职员最初都对他敬而远之。实际上，他是一个随着交往增多越来越使人

感到亲切和信任的人。每当喝起酒时，他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样能言善辩，以惊人的速度从口中涌出平时绝口不提的个人经历和人生经验，滔滔不绝。我对 H 先生所说的深感兴趣，多次和他彻夜长谈。

H 先生出生于东京附近农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小学毕业前被送到一家伞店当学徒。简单地说，就是难以糊口的农家为减少一个吃饭的人，送他去当一名只给吃住而不给工资的学徒。当这种学徒 成年做工 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尽管 H 先生忍耐力极强，也难以忍受伞店老板的苛刻 不久就被迫出走 成为流浪少年 但和今天的流浪少年的境遇有天壤之别。他出走后，前途茫然 无奈之下向东京奔去，一路饥寒交迫 露宿野外。

H 先生在人地两生的东京街头彷徨不已，在他因饥饿和疲劳即将倒毙街头之际，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小纸片——招收学徒。他不顾一切地向那里奔去 很偶然地那是一家装订公司 这一偶然的遭遇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涯。

当时，那是一家在日本数一数二的装订公司，属于同行业中的大企业。但在昭和时代初期，大

企业给人们的实际感觉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听一下 H 先生的叙述。

公司是一座大地震后建造起来的木质三层楼房，三层住着学徒，二层的一部分住着店主一家。这是名副其实的公司兼住宅 而且还兼车间、宿舍和办公室。工作时间通常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一个月中有一半以上的夜班，有时夜班要持续到深夜，每月休息一天，逢中秋节则休息两天。现在人们也许忘记了，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 1955 年左右。

作为学徒，当然要做早晨的清扫和晚间的收拾等杂活。H 先生身材矮小，他深有感慨地说：“我是个小子，当时更小。每当早晨七点多钟我抱着比我还高的扫帚在门前清扫时，就会看到那些挟着皮包、戴着制服帽的大学生们路过这里。我无法想像他们的生活，但我总在想，如果我也是一名大学生该多好啊！”不久以后，H 先生熟悉了公司的工作，懂得了自己的前途决不是黯淡无光的。

听了 H 先生的叙述，使我们不禁想到他就像生活在德川时代享保年间的年功序列制的世界里一样。无论是在享保年间还是在 H 先生的时代，